

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丛书

主编 李松



RESEARCH ON LOCAL MUSIC IN PINGYANG
PREFECTURE DURING QING DYNASTY

执中

——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研究

孙豪著



學苑出版社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基本科研项目

执 中

——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研究

孙 豪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执中: 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研究 / 孙豪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6. 6

(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丛书)

ISBN 978-7-5077-5039-3

I. ①执… II. ①孙… III. ①地方音乐—音乐评论—
山西省—清代 IV. ①J60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4630 号

责任编辑: 周 鼎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 010-67601101 (销售部)、010-67603091 (总编室)

印 刷 厂: 河北三河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尺寸: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2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丛书》

总序

李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中生成、完善、扬弃、起落和绵延，已经深深嵌入到每一个国人的生命历程，深深嵌入到家庭、社区、城镇每一个场域，深深地嵌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体系之中。今天，植根于农耕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到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叠加并置的发展阶段，进入到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全面推进时期，进入到实现民族复兴、文明崛起的中国时刻。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其作为从未中断的文明的那份荣耀，在时代转换和种种冲击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作为中华民族鲜明标识，在人格养成、社会重建、国格塑造和世界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一个看似宏大，实则具体的命题。每一个国人、每一个组织都可以也都应该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其中，投身实践，“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丛书”就是我们参与这一伟大实践的一份努力。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周巍峙、吕骥、孙慎、李凌、钟敬文、马学良等一批专家的推动下，我国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收集、整理、抢救民族民间文艺的工作，历时 30 余年出版了有“文化长城”之称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为推动这一恢弘巨著的组织、编纂和出版，文化部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也就是我们单位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几十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围绕着传统文化中最为鲜活、最为多样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搜集抢救、保存保护、传播传承工作。

中心是一个科研管理单位，其优势是策划并组织执行大型科研项目。我们深

刻把握现代社会变迁对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提出的新要求，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工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新的工作格局：一是继续推进传统文化资源的搜集抢救和整理工作，如正在进行的《中国节日志》《史诗百部工程》等。二是以传统文化资源为核心，推动传统文化资源数字化整备和利用工作，如建设的“中国记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基础资源数据库”。三是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指向，进行传统文化与科技融合项目，如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基于位置服务的文化旅游综合服务研究与应用”、“中国传统乐器声学测量与频谱分析”。四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传承传播为指向开展的一系列文化交流展示活动，如已经举办七届的“中国原生民歌节”、举办十余年的“澳门内地春节习俗展”。

在从事以上工作的过程中，中心的科研人员也形成了许多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与中心的核心工作紧密相关，多以民族民间文化的调研、资源的整理利用为指向，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田野考察报告，一类是文化资源数字化的研究与实践，还有一类是针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专著或论文。这些科研成果是伴随着中心的工作逐渐形成的，虽然不及专门研究者精深，但也有突出的特点和价值。首先，这些成果有着鲜明的实践指向，是带着从事文化保护工作的种种困惑，深入边村远寨、田间地头后获得的感悟，不是高高在上、坐而论道。其次，这些成果还有着跨学科的特点，是将传统文化置放于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情境之中，组织多学科的力量进行的文化与科技融合研究，还有就是这些成果对于当下进行的文化资源数字化工作、传统文化产业开发工作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决定以“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丛书”的形式将这些研究成果逐步推出，供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要感谢学苑出版社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丛书”出版的支持。正是在学苑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努力下，才使得中心科研人员在繁重工作中形成的成果得以面世。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成果的出版，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与我们并肩投身到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工作之中！

序 言

2010年12月的一天，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学生孙豪的论文在中国音乐史学会的年会上被评为硕士研究生论文的一等奖！我听了后开始一愣，因为我并不知道有什么论文评奖活动，也不知道有学生把自己的论文拿去参评，因此这个消息有点意外。后来一想，孙豪写这篇论文下了工夫，能评上奖并不奇怪。这是对他学习和研究的肯定，也算是个好事吧！现在，这篇论文又得以正式出版，要拿到更多的读者面前接受评判，这与获不获奖就没有关系了。因为每个读者心里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都会以自己的标准来做出判断。希望更多的读者得到的结论与当年评委的意见是一致的，也希望这篇论文能得到更多读者的批评！

这个题目为《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研究》的课题，研究的是晋南地区清代的地方音乐。研究所用材料主要源自两个方面，即以清代《平阳府志》为代表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及通过对晋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得的传统音乐材料。将清代地方志的记载中与现存于民俗活动中的音乐加以比较，分析其作用与意义，是本文的核心内容。所以，这是一个以仍在民间传承的传统音乐，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研究；也是应用了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调查，与中国的地方志文献材料及当地的文物材料相结合，对平阳地区的音乐进行的综合研究。

作者在硕士学位论文写作前进行的历史文献资料收集工作中，把山西方志一网打尽，计划做一个全方位的山西方志中传统音乐的系统研究。后来，为了能够突出重点，将论文的研究范围缩小到“平阳府”这一地域。这使调研的对象更集中，在有限时间内也会将研究进行得更加深入。论文的最后，作者还提出了富有创见的研究心得和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理性思考。

文中，作者提出了“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文化的形成主要根源于当地民间信仰和传统习俗背景下民众对音乐现实功用及象征意义的广泛需求等内因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外因的共同作用，其诸多对立融合的音乐表象既反映

了不同社会力量间的对抗与制衡，同时也揭示了地方音乐文化内部‘二元’与‘三元’并存的深层结构。对清代平遥府地方音乐文化内在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探讨传统社会与礼乐文化的本质联系，并且可为当下民间传统音乐的研究与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在这一基本研究思路的指引下，这篇论文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首先，作者提出的“二元”与“三元”并存的深层结构，指的是礼与乐的“二元”，在实践的操作过程与结果中，其深层的结构呈现出“三元”的特征。即“礼乐”中“礼”与“乐”的二元关系，在“对立”的“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后，又形成了“矛盾统合”的“三元”结构形式。作者应用了庞朴先生的“矛盾统合”的哲学观点来解释这一地方音乐的特殊现象。历史上，礼乐“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礼乐合一”的论点，是儒家的主流观点。比如，在《乐记》中，对于“礼乐”有这样的表述：“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说“礼”是与天地一样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像“天地”一样“同节”，如“天地”一样有“序”；说“乐”与“天地同和”，也是“天地之和”。“礼”的社会等级差别与天地一样是不可改变的，“乐”则是调和“礼”的社会等级制度存在差异的工具。与之相同的，是作者从清代的文献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在传统观念中，‘乐统同、礼辨异’；礼的特征是级序，乐的特征则是和同；礼是乐的内容，乐是礼的形式，这是比较容易理解到的礼、乐基本关系，这一理解也已获得长期的认同。”说明《乐记》中表述的礼乐思想，一直保留在不同的传统文化活动中。经过研究后作者又指出，清代的礼乐观又与历史有别：“乐可辨异，礼可统同。因为有乐，所以体现秩序；因为有礼，所以达到和乐。‘乐’是达到‘礼’的目的和手段，‘礼’同时也是达到‘乐’的目的和手段。礼乐之间互为因果、互为表里。”

其次，作者对于山西地域性的传统音乐研究，具有“先天局内人”的优势，因此在选题上的甄选值得充分肯定。地处山西南部的平遥府，拥有丰富的音乐文化传统，大量方志文献及活态民俗反映了这一传统，也是清代中国北方地方音乐文化的代表之一。这一选题具有地方断代音乐史和传统音乐研究的双重属性。在实地调研中，活态的传统音乐活动主要包括文庙释奠、关帝庙祭、乡饮酒、婚嫁、丧葬、庙会等内容，又以文庙释奠为代表的官方祀典音乐和以丧葬为代表的民间礼俗音乐两大类为主。主要音乐活动形式有乐舞、鼓吹、笙歌、戏曲等。在乐律、乐调、乐谱、乐器及表演形态等诸多方面，官方祀典音乐和民间礼俗音乐呈现了

既鲜明对立、又高度融合的形态特征。

最后，作者以戏台及碑刻等音乐文物资料，作为研究清代平阳府戏曲音乐的可靠证据，又以地方志、笔记、小说中的音乐史料作为清代地方音乐的文献资料，还以现今民间留存的活态民俗及其音乐作为民俗资料，进行了实物、文献及民俗三方面的材料的“三重论证”研究，使论证的有效性和结论的可靠性大大增强，也使对研究对象的“考察更为立体、视野更加开阔”。

作者说：“半个世纪以来，为了破解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谜题、发掘深厚的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研究者们不再限于书斋考据的工作方式，而大力增加对被视作为‘历史遗存’的活态音乐做田野调查与综合研究。从而，散落在各地的传统乐种得到了极大重视。为了证实这些为理论研究提供新材料、新线索的地方民间乐种作为‘遗存’的可靠性，音乐学家们又不得不对其进行溯流探源的工作。此时，相关的地方音乐史料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可以看出，作者清楚地知道前辈学者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从“地域音乐”的角度，对平阳府音乐的历史与遗存进行了全位的研究。所以，“梳理地方民间乐种的历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工作，搜集相关史料、情报也日益成为工作之要”。

1954年中国音乐研究所建立之时，以杨荫浏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开创的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以历史文献为主的音乐史料，结合音乐考古所发现的新材料，再结合仍然流传于民间的传统音乐民俗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编写了《中国音乐史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和《民族音乐概论》等中国音乐史与民族音乐理论的学科奠基性著作。作为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自成体系的文字体系，有独一无二的传世文献，还有不胜枚举的考古与文物资料；有保存完整、涵括众多民族的传统音乐，有各类品种的民间乐器，有系统的律学理论和独特的宫调理论，还有以古琴减字谱、民间工尺谱为代表的乐谱资料。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的音乐学的学科特点要与这些内容相结合，要与这些资料相联系。

与非欧的音乐研究对象相比，中国的文化特色也决定了中国的“音乐人类学”应有自己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写的《业务参考资料十二种》《民间音乐调查手册》等研究指导文件，反映了这些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湖南音乐调查报告》《河曲民歌采访》《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西安铜器社》等代表了这些理论与方法产生的研究成果，也奠定了中国

传统音乐的研究范式。

近 30 多年来，我们在学习国外的音乐人类学的各种理念与方法时，局内人与局外人，主位与客位，双重音乐能力和文化、行为、音乐的“三角模式”等等调查研究理念、研究模式与方法，为我们的传统音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打开了新的视野。从“人类学”等学科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构成上看，任何“新理论”总是伴随着研究对象中的“新问题”而产生的。如“进化论”“传播论”“功能-结构主义”“文化阐释理论”等等，以至对“漂移人群”的研究等等，无一例外。自学科建立开始，以异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因新问题的产生而不断产生新理论和新方法。因此，人类学等学科呈现出开放与发展的特征。

当音乐人类学被中国学者引入中国后，面对中国传统音乐及其依据的中国传统文化，仅以既有的理论与方法显然不足以解决中国文化的某些问题。仅从显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历史与文化背景上说，中国具有世界独一无二的、丰富的古代典籍，以家国为一体几千年来存在的宗法制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制、伦常传统，以儒家学说为主又兼具儒道释三教合一为特征的精神。从中国传统音乐上说，异彩纷呈的戏曲曲艺音乐、古琴音乐、民间音乐等各类传统音乐，历史悠久的宫调理论、律学理论，丰富完整的各种记谱法，品种齐全的传统乐器及其乐队配制，各具特色的民间传统乐种……都是音乐人类学在中国之外的研究对象中大多没有碰到的问题。因为，有文字与无文字的民族在文化的发展阶段不同，有文献与无文献的民族在文化的传承与历史的理念不同，有乐谱与无乐谱的音乐在历史的发展阶段和传承方式也不同。当产生于以无文字、无文献、无乐谱的研究对象的音乐人类学等学科引入中国后，其主要理论与方法中的“局内人、局外人”“主位、客位”，“观念、行为、音乐”三角模式，“文化阐释”与“深描”可以被中国学者直接引用于“田野调查”后，面对以上种种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特殊问题，既有的音乐人类学理论显然不能完全满足中国文化与传统音乐的研究需要。简单地照搬国外的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可能产生水土不服的结果。

梅里亚姆曾说：“民族音乐学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研究：人类学的方向和音乐学的方向……最理想的终极目标是这两种方法的融合，并在实际中对它进行修正。”（《音乐人类学》）在他看来，音乐人类学应当由音乐学部分和人类学部分共同组成，而音乐的声音是人类行为过程的产物，人类行为过程又是由创造某一特

定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决定的。这是对音乐人类学的正确评价与准确定位，也道出了音乐与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在方法论上，除了吸收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等学科的既有理论外，结合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特点，总结和探寻与之相符的研究手段十分必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口述史”式的访谈与记录，以真实地记录访谈对象所述的史实；进行全面准确的“民族志”式的文字、音响、图像、乐谱及乐器记录，以全面地记录研究对象及其所包含的音乐与文化含义。在往复的访谈中，不断将“碎片式”的材料“整合”成可靠的事实，并在访谈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仔细观察，积极参与相关活动。在访谈、观察、体验的各个环节中，以“局内人”“局外人”，“主位”“客位”等不同视角，观察研究对象及其参与的、与音乐相关的各类活动，参与并体验其中的音乐及其文化内涵。最后，将调查访谈材料进行调研报告的文字描述或更深文化内涵的“深描”，以介绍研究者的理解与认识。将某个“个案”进行详细记录，对其中的民俗、禁忌、符号、象征等含义与某种理论应用相结合，以典型案例的记录与描述，折射出研究主体的核心内容与完整面貌。这些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都应与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宗法制度，封建礼教与道德伦常等文化特征相结合。

在学术研究中，总体原则相同，具体方法不同；或总体原则不同，具体方法相似；再或总体原则相同，具体方法也相同，但研究视角不同等情况，产生结论相同或相似，结论相异或相反，都有研究成果可以证明各自研究的有效性。因此，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最后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应当成为包括音乐人类学等各学科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学术观点不同，研究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不同，都可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提下各展其雄。

研究方法是研究者手中的工具，正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道理一样，任何方法都有其适用的对象，因而任何方法都可能有效但又都不是万能的。离开了研究对象的需要，离开了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任何方法都可能失去原有的意义。从方法论上说，孙豪的这项研究，不但汲取了音乐人类学的理论滋养，针对研究对象的中国音乐文化特征，有意识地从“三重论证法”入手，结合“局内人”的视角，深入细致地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对“平阳府地方音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这项研究说明，在继承和发扬“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学术传统中，有效地应用音乐人类学及其他一切有益的理论与方法，是一次积极的尝试；这项研究也说明，在面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这一“新”的研究对象时，音乐人类学和中国传统



音乐研究既有的理论与方法都需要加入“新”的视角与新的内容，这就为“音乐人类学”增加了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与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综合研究的成功案例；这项研究还说明，它不是完美的，但对相关论题的研究从方法与手段上说，是有创新意义与启示作用的。

崔 宪

2016年6月



目 录

总序	1
序言	1
绪论	1
第一章 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活动	11
第一节 官方祀典	12
一、文庙释奠	12
二、关帝庙祭	14
三、文昌庙祭	16
四、乡饮酒礼	17
五、宾兴礼	19
六、救护礼	21
第二节 民间礼俗	23
一、婚嫁礼俗	23
二、丧葬礼俗	25
三、社祭礼俗	28
四、迎春礼俗	29
五、庙会礼俗	32
六、节庆礼俗	39



第二章 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形态	43
第一节 表演形态	43
一、大型乐舞	44
二、鼓吹乐	47
三、钟鼓乐	50
四、笙歌乐	51
五、佛道法乐	52
六、戏曲音乐	54
第二节 乐律乐调	55
一、黄钟标准	56
二、清十四律	57
三、审音配字	60
四、旋宫起调	62
第三节 乐器乐谱	64
一、乐器数量	64
二、乐器形制	65
三、乐谱类型	68
第四节 曲目曲体	69
一、音乐曲目	69
二、曲式结构	72
三、织体结构	78
第三章 清代平阳府文庙释奠礼乐	82
第一节 历史沿革	82
一、文庙释奠	82
二、释奠用乐	84
三、当下遗存	85
第二节 基本要素	86
一、时间场所	87
二、物品陈设	90

三、人员组织	93
四、经济构成	95
第四节 礼典仪程	97
一、前期仪程	98
二、正祀仪程	99
三、收尾仪程	103
第四节 音乐形态	104
一、表演形态	104
二、律制乐制	106
三、乐章乐谱	107
第四章 清代平阳府丧葬礼俗音乐	113
第一节 历史沿革	113
一、丧葬礼俗	113
二、丧礼用乐	116
第二节 基本概况	122
一、相关规定	122
二、实际状况	124
第三节 当下遗存	128
一、开吊仪程	130
二、祭灵仪程	133
三、出殡仪程	136
第四节 音乐形态	139
一、表演形态	139
二、曲目曲体	142
三、律调谱器	146
第五节 组织结构	149
一、人员组织	149
二、经济构成	155

第五章 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成因	160
第一节 信仰需求	160
一、敬鬼事神	160
二、尊祖孝亲	163
三、崇文尚德	164
第二节 现实功用	166
一、乐之于仪	166
二、乐之于人	168
第三节 象征意义	171
一、人神相通	172
二、等级秩序	174
三、国家正统	175
四、合礼正宗	176
第四节 历史传统	178
一、历史塑造	178
二、尊古重传	179
三、守旧纳新	181
第五节 社会基础	183
一、经济状况	183
二、社会结构	186
三、文化制度	188
第六章 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文化内核	191
第一节 二元对立	191
一、音乐形态	192
二、社会属性	193
三、文化属性	194
四、对抗力量	198
五、大小传统	201

第二节 三分统合	205
一、一分为三	205
二、三元结构	206
三、中间样态	208
四、中庸之道	210
余 论	215
一、礼乐相彰——论礼与乐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关系	215
二、音乐与社会——谈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背景下音乐文化的差异 及其原因	217
三、“音乐会下乡”——论传统社会或社区与现代音乐的碰撞	221
附 录	224
参考文献	264
后 记	272



绪 论

“礼失而求诸野”是《汉书·艺文志》里记载的一句圣言，据传是孔子之语。其意为，当社会已处于礼崩乐坏之境，如想探寻或恢复先前的礼乐文化，可以借助民间的力量。由此可知，至少在先师孔圣传道授业的时代，对地方礼乐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就已经受到重视。同样，在当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地方音乐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半个世纪以来，为了发掘深厚的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为了拓宽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范围，为了破解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许多谜题，中国音乐史学界的大多数研究者们走出书斋，将视角移向被视为“历史遗存”的活态音乐资料。散落在各地的传统乐种得到了极大重视，大量的田野调查与综合研究应运而生。异曲同工的是，舶自西方的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也使地方音乐文化受到了研究者的更多青睐。多年来，中国音乐人类学界的学者们，始终坚持以“活”在当下的中国传统音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此类音乐做全面考察。

无论是传统的史学，还是外来的人类学，当学者们在思考有关这些地方音乐文化的问题时，无一不对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地方音乐史料产生兴趣。为了证实这些为理论研究提供新材料、新线索的地方民间音乐作为“遗存”的可靠性，史学家们又不得不对其进行溯流探源的工作。在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时学者们发现，他们田野作业的对象虽然来自乡间，但却有着厚重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具足“高文化”特征。由此，梳理地方民间音乐历史成为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以地域为研究范畴的专门史日益成为学科建设的需要。

虽然地方音乐史料已经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在研究中引用其进行论证的实例也不鲜见，但从整体来看，在地方音乐史领域，较成体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而选择以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希望在此领域做一些尝试。这个同时具有断代音乐史与地方音乐史研究双重性质的课题，在研究对象的代表性